

中国人民大学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性社会学研究所

Institute for Research on
Sexuality and Gender<http://www.sexstudy.org>[首页](#) | [学科建设](#) | [基础研究](#) | [应用研究](#) | [著作发布](#) | [图书检索](#) | [通俗文章](#) | [文献介绍](#) | [讨论地带](#) | [通讯文档](#)您的位置: [首页](#) -> 《中国“性”研究》第26辑

圈里的“名人”：社会污名，公众形象和同志社区代表者的建构

作者: 魏伟 来源: 《中国“性”研究第26辑》 类别: 《中国“性”研究》第26辑 日期: 2008.05.18 今日/总浏览: 1/22

圈里的“名人”： 社会污名，公众形象和同志社区代表者的建构^[1]

魏伟

上海大学文学院 社会学系

在中国的同志圈子里，“名人”一般指的是那些圈内活跃，众人皆知的人物。在绝大多数同志选择隐藏性取向的社会环境中，成为一个名人，是很有问题并且伴随争议的事情，因为这是对一个带有污名的身份的自我肯定。但是，正如我在本文试图说明的那样，名人在一个日渐发展的同志社区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是同志公开身份的先驱，并为后来的同志提供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的模式；他们因为交际广泛，是同志社交网络的中心；在公众想象中，他们代表了同志群体和同志社区的形象。笔者认为，“圈里的名人”是同志人群寻求公共空间的先锋，并为日后同志社区的动员提供了潜在的领导者。与此同时，“名人”一词的内涵近年来有所变化，反映了有关同性恋的公共话语在同志社区内外都正在发生显著的变化。

“名人”：同志世界中道德化和性欲化的人物典型

在对改革开放后上海青年人性文化的生动研究中，Farrer（2002）详细讨论了“性人物典型”（sexual character）的概念，指的是“存在于人们想象中和城市生活相关联的人物典型，通过这些典型，人们挑战或者维护本地性文化中的道德界限。”这些性人物典型包括“大款”，“白相人”，“外来妹”等等，它们都是集体的建构，“从经验和表现的层面反映了道德话语富于争议的本质。”然而，依据对于这些性人物角色的考察，Farrer发现：

“这些和上海公共的性文化联系紧密的人物典型，通常具有反面的特质，而不是高尚的化身……这些人物是人们谈话中想象的主体，而这些谈话的主题通常是反讽或者‘负面’的。谈话中流露出的‘负面性’是日常谣言中道德话语的典型特点，也表现在人物出现的那些带有反讽意味的场景中。”（Farrer 2002: 87）

和这些性人物典型相联系的故事往往超越性伦理，富于戏剧性，但却从反面的角度再次肯定了社会中正统的性观念。

从Farrer关于性人物典型的研究中获得启发，我在本文中探讨“名人”这一人物典型。一个人怎样才能成为名人呢？成都同志圈里的名人之所以出名，可能因为各式各样的原因，比如样貌帅气，为人慷慨，善于交际——但是一切的名声都是基于一个事实，同性恋。用凯的话说，名人就是那些“敢于公开表达自我中同性恋的那个部分”的家伙。无论是使用真实的姓名，还是（更常见的）使用圈里的“别名”，名人是那些在同志圈里四处传播的故事的主角。名人的故事通常和性有关，因为往往以谣言的形式通过口头传播，故事的真实性和精确性就难免有出入，很多时候被建构成为都市传说（urban legends）。“超帅”就是一个样貌出众的名人。不少访谈对象都曾提及他的轶事，下面就是其中两则：

“超帅三十出头。他是那种永远无法安定下来的人。有一个人非常倾慕他的名声和样貌，最后把他追到了手。这个关系仅仅维持了四天，但是那人已经十分满足。”

“超帅有名是因为他从来不和上了20岁的人上床，全是和很小的孩子一起做爱。找一个年轻的，带他们去

玩，然后骗他们上床，第二天拿200块钱让他走人。圈子里很多都和他有过关系，但是我和他没有关系。因为这样，大家都认识他。他打羊胎素的，看起来很年轻。”

正如这两个例子揭示的那样，有关名人的都市传说通常的主题是性，而且是离经叛道的性，比如纵欲和滥交。通过批判名人们的性动机和性行为，这些故事从反面强调了忠诚，关系导向和性行为道德高下等正统的性观念。

[2] 有趣的是，这样的批判往往伴随着某种意义上的羡慕，因为人们可能也会嫉妒这些名人拥有的自由和勇气。

在一个同性恋遭受边缘化和污名化的社会中，成为同志圈里的名人超越了社会的道德界限。一个同志名人的名声，是对排斥公开表达同性欲望的社会既有道德秩序的偏离。在这个意义上，存在于公众想象中的名人拥有的名声不是“美名”，而是“臭名”。非常反感公开表达同性欲望，Ian为自己选择低调的生活方式进行辩护。

“你是一个同志，生来如此。这不是你的错，但是你随时随地表现出来就不合适了。我们都生活在同一个社会中。我们需要首先生活在主流社会中，满足我们自己的（性的）需要是相对次要的。我想两者之间肯定会有冲突，但并非无法避免。它取决于你怎样处理这些冲突……成都有些人就是这样一种态度，反正我是一个同志，或者我是一个0，我就可以行为很C，就可以表现我的本性，就可以肆无忌惮，大声说飘语。我很讨厌这样的行为。”

Jeffery 曾经在他的大学里成功组织了一个网上的同志学生群。当面对本地的一个同志志愿者组织的加入邀请时，他说了自己的考虑：

“他们认识我已经很久了。一直希望我成为他们的志愿者，但是，我有我自己的考虑。我不想成为……说句不好听的话……成为一个‘名人’。我一直以来都很低调。”

Ian和Jeffrey 的看法在今天的中国同志人群中非常典型。同性恋者在社会中的边缘地位，让他们格外小心，以免对自己的生活造成损害。在这个意义上，不安全感既能滋生激进主义，也会导致保守主义（Altman 1993）。

那些已经成为名人的同志，对此却有不同的看法。自我认定是一个名人，斌说：

“我在这个圈里也算个名人。你认识的人越来越多，你就成为一个名人了，这是自然的事情。当一个名人，无所谓好坏，也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

我选杰作为访谈对象，很大程度就是因为他的名人的身份，尽管他本人并不这样认为。

“很多人对于名人的看法，是贬义要多一些——我不把自己当名人看待，我不知道别人如何看待我。认识我的朋友，他们觉得我很好，我就心满意足了。最起码，全国各地的朋友，只要说起我的名字，都说他很对，我就满意。我们同志，很不容易，大家能够认识，是一种缘分，我还是很珍惜这种友谊。现在他们说我是名人，也无所谓，至少我的名声是好的。作这样的名人，我觉得还是多欣慰的。”

和Farrer笔下上海（异性恋）性文化下的故事一样，成都同志圈里的名人的故事也是特定社会语境下的文化产物，这个语境中有关同性恋的话语影响了人们对于这些故事的理解和诠释。故事未必一定要反映某种“社会真实”，而是提供了一种对同志社区内事关公开身份和亲密关系等问题的道德话语进行表达的途径。

生活经历的新模式：同志身份，同志家庭和同志职业

尽管总是伴随着争议，名人们在一个日益发展的同志社区里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当绝大多数同志选择“假扮”异性恋者，名人是首先敢于站出来，按照自己的同性欲望进行表达和行动的群体。公开身份已经差不多20年，鸿生是成都同志圈里最有名的人之一。说到自己作为同志的生活选择，鸿生显得振振有词。

“这真的和我自己的经历有关。我从来就认为自己是一个很优秀的人，无论在学校还是工作单位。既然如此，如果我能够比很多人都要出色，没有人有干涉我私人生活的权力。我就是这样一种人。我不会像其他人那样把自己隐藏起来。”

鸿生2005年国庆期间在自己开的酒吧里和同性伴侣举行了隆重的婚礼。这是他的第四段同性“婚姻”，和前面三次不同，这次婚礼还邀请了媒体到场。第二天，成都的普通市民都读到了“男同性恋者第四次举办婚礼与同性恋恋人结婚”的报道。

“这里正在举办一场‘婚礼’。但这是一场至少得加四五个‘引号’的虚幻‘婚礼’：没有‘新娘’，只有两位‘新郎’；除了自我认同，并没有法律上的支持。其中的一位，就是本报曾经报道过的积极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的44岁的鸿生。他自嘲自己是‘结婚狂’，因为这次是他第四次‘自娱自乐’地走进‘虚幻围城’了。不过与前三次不同，这次有了年迈父母和中学同学的认同和祝福。另一个不同之处在于，他们主动联系媒体，向世人

展现自己选择的人生道路。” [3]

通过媒体的报道，鸿生的名声已经从圈内传到了圈外。

凯公开身份的经历是一场“灾难”。由于分手时的争执，前男友把凯的事情告诉了他的父母，他被赶出了家门，后来又因为同样的原因丢掉两份工作，凯决定走“极端”了。

“那段时间自己真的很惨。我和我的直人朋友一起生活了一段，但是我觉得我不属于他们，于是，我就做了一个极端的选择。那年，有一个反窜的表演队来到成都，当时在圈里十分轰动。有些家伙受到了启发，也想通过这样挣钱。鸿生在夜天堂过生日，那里正在搞反窜比赛。那晚我也去，他邀请我加入他的反窜表演队，到各地演出，开始一种新的生活……这样他（凯的前男友）就再也不能破坏我的工作和我的生活了。我就说好吧，那就试试看吧。”

后来凯成为鸿生反窜表演队里的“金牌主持”，再也不用担心会因为同志而丢掉自己的工作。通过以一种高度符合刻板印象和挑战性别界限的方式，凯坚定了自己作为一个同志的身份。

鸿生和凯的情况相对例外，对中国今天许多同志而言，公开身份不必一定需要公开的对抗，而是表现为接纳自己的同性欲望，坚持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很多名人不一样，杰作为名人，用的是真实姓名，而不是圈里惯用的别名。杰和他的男友是成都同志圈里的一对模范“伉俪”——不仅因为他们在一起已经生活了8年，而且还因为他们在经济上不分彼此，一起买房供车。

“我们没有分彼此。我知道很少有人这样做。有些朋友也劝我不要什么东西都放在一起，但我们一直都是这样做的。我们一起买房子，一起买车子。”

杰接着告诉我他对这段关系的期望。

“我们刚好的时候，我们满怀信心地走一辈子的，因为他们父母知道我们的事情，然后我们两个都是比较顾家的人，热爱家庭的人，大家一起走完，走完这辈子，还是多幸福的……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追求结果，毕竟没有看到过这种结果的东西，自己听说的也没有，但是自己还是想要去创造。”

杰满怀热情谈论的这个“结果”就是两个男人携手共度此生。并非基于传统或者血缘，这是两个男人自己达成的共识。因为这是“不同寻常”和带有实验性的人生经历，朋友们担心他们“把什么东西都放在一起。”杰有时也有这样的顾虑，“毕竟没有看到过这种结果的东西”。然而，正如杰所说“自己还是想要去创造”，他的叙事强调了行动者（agency）的作用。在亲密关系的领域自我创造的想法，是对新的归属感的一个强有力的肯定，也是坚信同志身份和同志生活方式有效性的关键要素。当我采访杰的时候，他和他的男友正在经历着“冷战”。杰在一家国有企业里工作，“保持单身对获得提升十分不利”。和鸿生与凯相比，杰的结婚压力更大。尽管面对巨大的结婚压力和同志关系中出现的波折，他仍然固守自己的生活选择。

现代同性恋身份认同的发展让男同性恋者能够围绕性倾向重新组织自己的生活。生活的重新组织首先发生在私人的层面，以发展和建立同性亲密关系为特征。对于有些同志名人来说，这还可以超越亲密关系的范围，影响到他们职业生涯的发展。人们的职业选择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比如教育水平，经济资源和社会网络。鸿生和凯从事与同志有关的服务行业，最初可能只是因为偶然。另外一些同志则有意识地把个人生活和他们的职业发展联系起来。阿正就曾经开过一家摄影工作室，专门面对男性的同志顾客。

“我在一家大的影楼工作的时候，我就想到了专门做男性顾客的摄影工作室的主意。我跟一名经理谈了这样的想法，他正好有一个闲置的工作室。那个时候还没有一家专门为男性拍照的工作室，于是，我开了一家，取名‘阿正男性影像工作室’。作为成都第一家面向男性顾客的工作室，我在网上进行了推广。《成都商报》了解到这件事，也采访了我的工作室。他们用显著的版面对我的工作室进行了报道。”

据阿正介绍，他的顾客主要是男同志，不过，工作室的生意并没有持续多久。2005年秋天我遇见阿正的时候，他到新开张的一家同志酒吧做经理。没有大学学历，阿正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中难以找寻自己的位置。同志商业场所的发展，为像他这样对同志圈子甚为了解的人提供了新的职业发展的机会。

同志网络的中枢：从浪荡男人到同志权利倡导者

同性恋者的世界很大程度上仍然围绕休闲展开。污名和隐蔽的现实，使得个人生活和工作时间无法整合，所以休闲时光的价值对于同性恋者而言，就不仅仅意味着放松，而是同志经历的重要部分（Warren 1974）。因此，善于社交，喜欢玩耍是成都同志圈内名人最为重要的素质。什么使得一个同志称为“名人”？斌的回答非常简单。

“你喜欢出去耍。你认识越来越多的人，这样你就成了一个名人。拿我来说吧，我差不多每个礼拜晚上要出去三次。”

他一般在经常光顾的同志酒吧订上一桌，叫上啤酒，等着朋友的加入。朋友可以带上自己的朋友，这样斌就可以认识新的朋友。身为一个老顾客，斌是鸿生和其他同志酒吧老板的朋友。在自己的酒吧里，鸿生是当然的“明星”，来往于各桌招呼客人。如果鸿生心情好，他还会走上舞台为自己的客人高歌一曲。如果鸿生的热情好客，可能受到商业利益的驱动，杰就真是一个好客的主人。在杰和男友搬到现在的新家以前，他们租住在市中心一户三居室里，那个地方号称“飘飘^[4]活动中心”。

“我们是朋友多，因为以前我们住在市中心，租的房子，一直在那里。我们是前年买的房，才搬走的。当初朋友比较多，都爱来耍，可能是我也比较好客，大家来耍就来耍吧，也无所谓。喝下茶，吃顿饭也吃不穷，大家在一起，打下麻将，摆下龙门阵。周末的时候人特别多，基本上是每天晚上都有人，都喜欢过来耍。”

杰的好客，名声远扬。他的住处时常接待来自各地的同志朋友，甚至还有一位在成都研究同志生活的德国学生，于是杰又得到另外一个绰号：“全国飘飘在成都的联络员。”

上面提到有关名人的一个说法就是他们到处和人上床。斌认为这完全是胡说。

“性伙伴多未必就让你成了一个名人。那些‘暗猖’^[5]一般都有很多性伙伴，但这些人都不出名。”

在杰看来，身为“名人”实际上降低了和其他人发生性关系的机会。

“可能是因为名人，太熟了，去日光^[6]从来就是坐在外面看报纸，和他们吹牛。毕竟进去后，很多人要去，认识的人还是很多，进去后他们给你打招呼，你就是想干什么，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看一下报纸，大家伙在一起摆龙门阵算了。当初我和另外几个朋友约到一起去，他们也晓得。他们知道我的BF，如果我去，是最放心的。他们说，你好倒霉嘛，这就是名人的悲哀。”（笑）

名人们时常被风言风语包围。我的观察是带有污名的“名声”往往会影响到名人们的个人生活。当保持低调是同志圈里一个普遍的生存法则时，很多人不希望和曝光过多的“名人”发展亲密的个人关系。

名人不但是同志世界公开身份的先行者，而且也是一种新的同志生活方式的实践者。同志关系和同志家庭得不到国家和社会的承认，因此同志只能通过一种自我肯定的方式密切彼此的关系，但这样的自我肯定往往遵循的是主流社会的价值和观念。越来越多的同志像鸿生这样选择民俗婚礼的方式公开表达对于同志关系的追求。鸿生开玩笑说自己是一个“结婚狂”。在最近这次高调的婚礼上，他说：“许多人认为我结婚的次数太多了，但是对每次我爱的人，我都是非常真诚的。”尽管同性婚姻的议题离法律的层面还有相当的距离，同志伴侣也不可能得到异性伴侣拥有的保障和福利，但是庆祝同志关系的仪式，向社会明确传达出这样的信息，那就是同志也向往稳定持久的个人关系，渴望归属于他们生活的这个社会。基于同样的原因，杰和男友共同买房买车的决定，也是向稳定亲密关系和争取社会认可做出的一个积极的姿态。虽然不少同志对杰的做法抱着一个怀疑的态度，他们也认可这样一个巩固同志关系的模式。在这一点上，明告诉我他对于未来关系的期望。

“我身边有对朋友。两个共同买房，目前维系三年多，没有出过什么问题。我也还挺关注他们两个的，如果我能找到像他们那样的共同住房，我就满足了，我就可以放弃我的婚姻。如果没有找到合适的，愿意共同住房的，我就不愿意。不然再好找了个BF，也三五年，一晃而过。现在觉得……可能就是我的那个朋友给我讲的，我现在就是缺少安全感。”

寻求接纳和挑战传统都可以在肯定同性恋亲密关系的实践中找到（Lewin 2001）。当我问杰和他的男友有否考虑收养小孩，他回答说：

“当初还是有这个打算，想去领养一个。但是觉得领养来了以后，可能两个男的一起生活，怕对孩子有影响，我觉得还是放弃。我们可以参加青年志愿者，捐钱啊，领养孩子可能还是不现实。两个男的，从小领养一个，又不是很会带，你拿给父母带的话，也不是很合适向父母提出。大家觉得多参加社会的公益活动更好一些。（你参加什么样的社会公益活动？）当初我们俩都填表到网上，填了个四川的青年志愿者，后来没有通知我们搞过什么活动。最起码我们自己，比较环保，包括我们开车出去耍，全程都是带垃圾袋——我们在大草原耍，那些藏族娃娃到处扔垃圾，我们都说他们。包括废旧电池，从不乱扔，都带到商场去扔。”

生育作为组织家庭的中心原则，已经越来越多地遭到异性和同性家庭的日常生活实践的挑战。杰的回答特别引起我兴趣的地方，不仅是他否定了养育后代是家庭核心功能的传统看法，而且试图将个人关系的基础建立在对于公共利益的关注之上。

随着年岁的增长，对杰和他的同龄人而言，已经开始面对将来养老的问题。在访谈的尾声，我提出“在我们的访谈中，是否有什么重要问题，或者对于你个人感触很深的事情遗漏了？”杰这样回答：

“我觉得感受比较强烈的是自己老了以后怎么办，这个问题自感觉，己有时还要想，因为毕竟问我36岁，特别是我一个人待在家里的时候，想到这个问题，都有些后怕的感觉……我们年龄一般都在28岁以上，到35岁了。我在我们的朋友当中，算比较大的了。还有几个偶尔联系的朋友，他们都是结了婚的，37，8或者40岁。我们在一起耍的朋友都是不结婚的，我们经常开玩笑，说以后老了大家就在一起生活，经常开这种玩笑。这个问题考虑多，但我绝对不会去结婚的，伤害一个人，好恼火哟，因为结了婚以后，可能离婚带来的后果是一样的，我还不如自己把这个痛苦背了。只是一个人痛苦，比两个人痛苦好，不然越来越多人痛苦……有时我想也对，当时我住医院时，我们朋友对我太好了。他们如果不上班，都到医院来守我，陪我聊天，每天都有几人来守，给我送中午饭，我让他们不要送——友谊还是多可贵的，在飘飘圈子里比较少。我好感动。出院后请我们这些朋友去大吃一顿，我特别感动。这帮朋友真的是一辈子的朋友，大家以后有什么事一定要帮忙。”

在对非异性恋家庭的研究中，学者们已经充分地讨论了“选择的家庭”的出现。同性恋家庭的组织和结构，和传统上建立在谱系，血缘和婚姻基础上的关系相比较，具有更宽泛的意义。它包括超越血缘联系，基于友谊和承诺的类似亲缘的关系网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同志家庭不是“血缘的家庭”，而是“选择的家庭”（Weston 1991， Nardi 1999， Weeks et al. 2001）。虽然把朋友视为家庭成员可能是一个相当美国化的观念

[7]，但也可以在杰关于朋友的叙事中找到。通过满足社交，情感和物质的需要，同志朋友圈子发挥了替代家庭的功能。当杰说到年老的时候和朋友们一起过的想法，这不能单单理解为一个玩笑，它表明在对于亲属关系创造性的想象中，血缘不再被认为是唯一的标准。

如果杰和斌这一代的同志成为名人，主要因为活跃于同志场所，互联网的兴起则为产生新的名人提供了条件。把自己“出柜”的故事贴到网上后，骄傲彩虹很快在成都大学生同志圈里出了名。在他的个人网页上，骄傲彩虹写道：

“我是一个同性恋，这让我很高兴。现在，我已经公开了我的身份，这让我的生活变得更好。”

由于这样的态度，骄傲彩虹从来不害怕谈及同性恋的话题。他在校园里公开粘贴海报，为自己发起的网群招募成员，散布与同志有关的信息。骄傲彩虹学校假期回到东部的老家，还受邀到当地的广播电台讨论同志的事宜。

对于骄傲彩虹公开直接为同志摇旗呐喊的方式，尽管人们的反应褒贬不一，但的确为同志大学生树立了一个积极的样板，尤其是那些自我认同倍感挣扎的青少年。如果许多青少年在这个问题感到孤立无助，骄傲彩虹改变了他们的看法。得知同龄的其他同志也能快乐的生活，对于许多青少年同志来讲，不啻是一个巨大的慰藉。诚诚回想起和骄傲彩虹的相遇是怎样把他从自杀的边缘挽救了回来。

“我无意看到骄傲彩虹帖子……见我特别痛苦，有告别人间的想法，他就到学校来开导我。他开导我的时候，我就突然意识到，这个人和其他人不一样，首先他对那方面特别了解，口才也很好，给人的感觉也很好。很奇怪，他说话我能听进去，在我那么痛苦的情况下，我真的觉得很奇怪，他说的话我竟然能听进去。以前很多朋友的话，我都听不进去，然后他们就只好告诉我一些同志网址，让我上去看，骄傲彩虹很会开导人。他让我从痛苦中慢慢站起来，有了自我，以前是没有自我的。”

因为背负带有污名的性取向，许多青少年同志感到压抑和孤立。诚诚的故事极好地说明了一个肯定同志的视角是如何帮助克服日常生活产生的社会疏离。出于对骄傲彩虹的感激，诚诚对于“名人”有着不同的看法。

“用我们学校一个学长的话来说，你的命很好，因为你进圈子认识的人都是……不能算呼风唤雨，但都是都撑得了舵的人。在圈子里面，比较出名，比较有地位和比较有威望的人……对圈子的学识比较渊博的一些人。他说，你认识骄傲彩虹，他在成都的圈子里非常有名……你不像有的人进圈子，认识的都是一些小混混，以至于他在这个圈子里面有一个错误的认识。刚进来，就被小混混一直伤害，扭曲的心理。你算很幸福的，你认识的人都比较好。从这一点来说，我是很感谢上天的。”

虽然名人作为一个群体经常伴随着争议，他们扮演的角色对于一个正在形成的同志社区是重要的。像斌，鸿生，杰和骄傲彩虹这样的名人，不光在自己的圈子里十分活跃，而且也认识其它同志圈子里的人。因此，他们成为本地同志网络的中枢，将私人的小圈子和一个更大的社区联系起来。更加重要的是，随着越来越多的同志选择公开身份，他们作为同志权益倡导者的作用更加突出。从他们身上，同志能够想象和体会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的可能。

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同性恋是中国公共话语中的禁忌，同性恋人群在社会中是“看不见”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的日渐开放，同性恋的内容忽然在新兴的商业化运作的大众传媒中变得常见起来。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编辑和记者们对于同志人群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兴趣。他们试图从中寻找更加“刺激”的故事，来吸引读者和观众，进而提升销售和广告收入。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商业性媒体的经济驱动和大众“集体窥视”欲望两者的互动，同志名人被推到了大众传媒的聚光灯下。

自称是一个同志运动积极分子，阿正在成都的同志圈里是一个富于争议的人物。他曾经是数起网上交友引发的同志犯罪的受害者。其他同志遭遇这样的事情，多半保持沉默，而阿正则选择了报警。在这一过程中，如果他认为本人的同志身份使自己在公安局里受到不公正的对待，阿正就会向媒体寻求帮助，把这些涉及同志的案件进行曝光。就在我访问他的一周以前，阿正就有过这样的经历。

“几天前我在西门被（我在网上遇到的那个）人抢了。我到派出所报了警，一个40多岁的警察对我说，你们这些人就是‘喜欢’这些事情。我当时一下子就火了，我非常生气……向他吼：‘你最好注意你说的话。’他也火了，说什么‘你在这里逞什么能耐？如果你那么厉害，为什么不在抢你的人面前露出来？如果是我的话，我宁可死在那里……’我朋友劝过我后，我冷静了一些。他说的话真的很伤人。我们本来生活就不容易，好不容易现在获得了一些理解，他说我们喜欢这些玩意。他不明白这是我们本性的一部分。”

卷入了另外一起与同志有关的敲诈事件，阿正把警察招到了日光桑拿。

“我在里面遇到了一个家伙。他先勾引人上床，然后进行敲诈。是他先跳上我的床的，结果第二天早晨他向我要钱。我非常生气，就拨了110。警察一会儿进来了。我们两人都被赶了出去。桑拿的老板还骂我，说我有病……还有一次，我看见一个岁数大的人，可能不是同志。他可能摸了谁一下，或者没有，结果被打了一巴掌。一群人，卖身的，那些垃圾，成天都在那个地方，因为很便宜。他们差不多住在那里。桑拿的人也不管。那个老家伙被打惨了，就这样算了。我觉得桑拿里面太乱了。如果我这个权力，我肯定立马把那个地方给关了。”

阿正认为自己把同性恋问题公开化的做法是正确的。当描述在现实生活中的遭遇的时候，“歧视”是阿正经常使用的一个词。由于社会对于他们的漠视，同志人群本来就不利的处境进一步恶化，所以阿正就想打破这样一种“看不见”的状态。然而，阿正将同志的“地下世界”曝光的做法，在同志社区内部引发了巨大的争议，不仅因为这样的曝光往往集中在同志生活的“阴暗面”，而且也危及了类似日光桑拿这样依靠躲避公众注意进行运作的同志场所的生存。

阿正的同志身份引起了本地一家电视台的兴趣，于是他们制作了一期反映阿正同志生活的节目。他们还在阿正的家里采访了他的父母和以前的老师。作为参与这个节目的条件，阿正要求这期节目必须进行“正面”反映。最后公开播出的是编辑完成的半小时节目。阿正回忆当时节目中观众提问的环节。

“第一个问题是……问我什么时候成为一个同性恋的？观众坐在摄影棚里。他们问的问题包括我什么时候‘变成’同性恋的……我告诉他们……我还保存了这期节目的录像……我并没有变成一个同性恋，我天生就是这样的。他们还问我这样是不是和交女朋友有什么关系。我从来没有这样的经历。然后主持人又问这个群体男性角色和女性角色的分别……我对她的问题进行了纠正，说没有这样的区分……同性恋就是同性恋……可能在主动和被动方面存在一些差异。他们不停地问这样的问题。观众对同性恋的了解很少……作为一个同志，我们在生活中面临怎样的压力。节目结束后，我感觉许多人对这个问题有了更好的认识。”

作为本地公开上电视的第一个同性恋者，阿正很快就成了名人。但是，他却没预料到接下来发生的事情。阿正接着讲述那期节目播出以后，他是怎样遭到同志社区的孤立。

“事实上，我感觉……对于圈子外面的人，这也没什么……甚至我工作单位的同事……他们在这个节目以前就知道我的事情，这以后也更加能够理解。问题真正是圈子里面的人……一些人说，我上了电视，那我就成了名人。他们在聊天室再也不愿和我聊天了。更恶劣的事，说我得了艾滋病的谣言在圈子里面传开了。这是网上一个人告诉我的。我知道有些人不喜欢我，所以他们会编些事情来诋毁我。”

阿正认为他被孤立的原因是他代表了一个不受欢迎的形象。

“这就是这个圈子里面的规则。如果你长得帅，又有钱，你可能还能引发一些正面的回应，但是，如果你长得不行……又没有一个好的工作，这就会带来问题。出了名以后，你就会被很多谣言所包围。”

现在，阿正不得不面对一个令人沮丧的现实，当他成为一个“名人”以后，他的“朋友圈子越来越小”。

在阿正成为同志圈内名人的过程中，大众传媒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暂且不论阿正决定在媒体上公开身份，是否怀有别的动机，他的确也是希望找寻社会的承认去肯定自己的性别身份。毫无疑问，媒体对于社会上“沉默”的同志人群的关注，是一个积极的变化。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用一个批判的眼光去看待媒体对于这一人群的表现。值得指出的是，对于现象的任何表现（representation）都是植根于特定的历史，文化和社会语境中。特定的表现被生产出来，经常是为了帮助表现者进行自我理解，并阐释他们眼中的世界，而未必真正为的是被表现的群体。节目向阿正提出的问题，显示流行的关于同志人群的刻板印象非但没有得到纠正，反而被进一步强化了。虽然一个身份公开的同志占据了舞台的中心，但他不是作为一个能够以肯定的方式阐释自我体验的主体，而是一个不断遭到质疑和审视的客体。本地同志社区不接受这个“突破沉默”的时刻，这样的反应也就不足为怪了。一个研究参与者事后对阿正和那期节目进行了如下的评论：

“从各种途径我听说的情况看，大家对那期节目的反应并不好。比如，有些同志认为他（阿正）不应该在节目里和那些人争论。他们问的问题非常愚蠢。如果他被那些愚蠢的问题缠住了，显得同志也很愚蠢。我在媒体的朋友看了这期节目后，给我打电话。他们认为阿正不知道怎样应对观众和媒体……他所代表的形象也不是很好……观众和主持人提的问题就很差劲，他也不知道怎样去摆脱那些问题，把关注点转移到更重要的问题上去。另外一些同志认为整个节目的设计都是有问题的，因为观众的教育程度不高，对同志的问题也缺乏必要的了解……他们也不是十分开明……即使那个主持人对这个问题都没有很好的认识，最后的效果非常糟糕，也就不奇怪了。”

因为围绕同志人群存在太多的误解和谎言，媒体在进行报道之前，需要进行一些基本的研究和认真的调查。阿正的这次接受访谈，媒体处理同志事宜的方式是很有问题的。它揭示了这样一个可悲的现实，媒体对于同志人群可能具有的由衷的兴趣，却往往被曲解的认识和刻板的印象所误导。

关于鸿生婚礼的报道，同样也反映出媒体权力的滥用。在我文章前面引用的那篇报道中，记者这样写道：

“国庆节，鸿生向刚（鸿生的男友）表白了自己的心意。经过一整夜的思考后，刚答应了鸿生，愿意与他

组建一个‘家庭’。”^[8]

可就在10天前，同一个记者写了另外一篇文章，谈及鸿生和他的前男友小曾共同生活8年后分手，仍然携手抗击艾滋病的故事，其中有一段是这样写的：

“‘离婚’后到现在，小曾还是独自一人；鸿生曾经有过新的伴侣，但目前也回归‘单身’。鸿生对记者说：‘其实我知道小曾是个好人，如果他能够接受，其实我还是很愿意和他‘复婚’的。’”^[9]

在这里我并不是争论上面的两篇报道是否真实地反映了鸿生的情感状况，而是认为这样的报道实际上强化了同志对待亲密关系很随便的刻板印象。我的确相信媒体记者在报道阿正，鸿生或者同志人群时，是不乏同情和理解的。但是，阿正充满麻烦的同志生活，或者鸿生对于个人关系的一种游戏的态度，可能是引发媒体关注最初的原因。通过对同志生活进行选择性地表现，媒体可能会维护甚至强化对于同志人群的误解。因此，正如Gamson指出的那样：“文化上的可视性（visibility），特别是在商业的背景下发生时，并不是一个通向解放的直途；事实上，它很容易被引向歧途。”（Gamson 1998）

围绕阿正在电视上公开身份的话题，也揭示了同志社区内部关于“代表谁”和“谁代表”问题上的争议。成都的同志社区内部差异很大，所以对于同志社区的任何表现，在得到一部分人认可的同时，可能会让另一部分人不能接受。对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同志来说，对于同志身份的得体表达始终是一个很受关注的问题。他们尤其在意同志的公众形象。作为一个追求职业发展和物质成功的群体，他们当然不能认可被一个“长得不行... 又没有一个好的工作”的同志个体所代表。同时，中产阶级在政治上普遍比较温和，所以他们对于阿正一些激进对抗的做法颇有微词。在一个异性恋中心主义的社会中，尽管所有的同志都处于一个不利的位置，但是由于阶级地位的不同，个体受到异性恋主义的制约和限制是不同的。虽然和阿正共有一个背负污名的性别身份，中产阶级同志能够从自身具有优势的阶级地位中获益，所以他们倾向于淡化异性恋主义对于他们生活的影响。与此相对，阿正缺乏这样的阶级优势的资源，所以他可能更能切身感受到来自异性恋主义的压迫。

在当代中国的大众传媒中，同志人群声影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他们也期望这样的文化“可视性”能够进一步转化为新的政治和社会权益，获得更加充分和自由的公民权。但是，中国的同志人群在现实中面临一个“表现”的困境。一方面，他们希望在媒体中看到对于同志人群的正面表现；另一方面，那些符合“合适形象”标准的同志又不愿意在媒体上亮相。当媒体把阿正或者鸿生放在了聚光灯下，后者代表同志社区的资格受到了质疑，因为他们可能把媒体的焦点引向了同志生活的“阴暗面”。从这个意义上看，在公众面前新近增加的“曝光度”，对一个内部阶级差异日益显著的同志社区而言是一把“双刃剑”。尽管它显示了同志人群不被了解的人性的一面，也存在在公众的想象中散布更多的偏见和汇聚更多的污名的可能（Gamson 1998）。

参考文献

Altman, Dennis. *Homosexual: Oppression and Liberation*.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3.

Farrer, James. *Opening Up: Youth Sex Culture and market Reform in Shanghai*.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2.

Gamson, Joshua. *Freaks Talk Back: Tabloid Talk Shows and Sexual Nonconform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

Lewin, Ellen. “Wedding without Marriage: Making Sense of Lesbian and Gay Commitment Rituals”. In *Queer Families, Queer Politics: Challenging Culture and the State*, ed. Mary Bernstein and Renate Reiman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

Nardi, Peter M. *Gay Men's Friendships: Invincible Communiti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

Rubin, Gayle S. “Thinking Sex: Notes for a Radical Theory of the Politics of Sexuality”. In *Pleasure and Danger: Exploring Female Sexuality*, ed. Carole S. Vance. New York: Routledge, 1984.

Warren, Carol A. B. *Identity and Community in the Gay World*.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Inc. 1974.

Weeks, Jeffrey, Brian Heaphy, and Catherine Donovan. *Same Sex Intimacies: Families of Choice and Other Life Experiments*.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魏伟. “城里的飘飘:成都本地同性恋身份的形成和变迁”，《社会》，2007，1。

Weston, Keth. *Families We Choose: Lesbians, Gays, Kinship*.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1.

^[1] 本文出自作者的博士论文《公开：成都同志空间的形成和变迁》。文章部分内容曾于2006年4月在芝加哥大学举行的第八届芝加哥民族志研究年会（8th Annual Chicago Ethnography Conference）宣读。

^[2] 参阅 Rubin（1984）关于性行为道德评判等级的讨论。

^[3] 《成都晚报》，2005年10月9日。

^[4] 成都本地对于同性恋者的俚称，见魏伟（2007）。

^[5] 成都同志圈中对于那些隐藏真实身份的人的戏称。

^[6] 成都著名的一家同志桑拿。

^[7] 美国同性恋社区把朋友作为亲属的观念，在艾滋病泛滥的年代尤为突出，有关的讨论参见Nardi（1999）。

^[8] “男同性恋者第四次举办婚礼与同性恋人结婚”，*Chengdu Evening Daily*, Oct 9, 2005

^[9] “成都20年同性模范夫妻，离婚了为‘艾’再携手”，*Chengdu Evening Daily*, Sep 29, 2005

关闭窗口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未经允许请勿转载，如有任何问题请联系我们。

Copyright ©2002-2005 中国人民大学 性社会学研究所 All Rights Reserved
京ICP备05053204号 电话: (010) 62514498 Email: book@sexstudy.org